

中國的「新社會主義文化」與新文化

田英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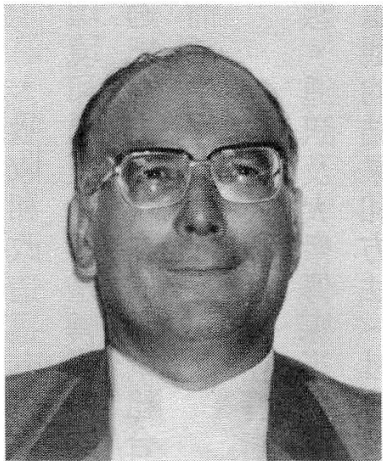
陳愛潔譯

中國最近的歷史發展不但再次顯示出對「文化」浪潮的關注，中國本身也興起種種新文化。為避免讀者對本文有任何誤會，請容我先集中闡述「文化」一詞的不同意義及層面。

中文的「文化」一詞，是十九世紀末從日本傳入中國的。「文化」與「文明」一詞，都是由「文」字組成的。「文」字解作模式、裝飾、語言與文學、教育與識字、政府中非軍事層面活動及社會生活。「化」則意指為改變及進步。因此，「文化」的基本意義，就是透過自然的行為模式、語言與學習、教育與社會認可的行為所促使的改變。（註一）

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詞有不同的意義：

- 一套價值觀念系統、傳統、習俗、信仰和信念、行為模式，人們可以藉此確立自身的身份。（這套價值體系的靜態一面稱為「文化遺產」）；



• 吸收和改造這套外在及內在價值觀念系統的
環境和過程（即是轉變中的動態層面，由該民族透
過把過去和現在的元素組合起來而實踐；這常是新
而活生生的現象）；

• 透過人和社會在藝術、文學、哲學、意識型
態、通訊及大眾傳媒等各個領域而宣傳這套文化價
值觀的結果和方法（社會及商業層面——「文化產
品」）。

明白到「文化」的不同意義，我們可以得出兩
個基本的取向去處理「文化」這課題：

• 靜態方法：視「文化」為一個明確和固定的
寶藏，透過某些調整而加以傳遞或接受；
• 動態方法：認為文化是活生生的，並透過人
民的反應和交流而不斷改變。

官方對文化的了解和接觸

爲了掌握中國現時文化中各個層面的意義，我
將透過上述兩個方法來討論這課題。首先，我將檢

討中國當局所採用的靜態方法；中國當局希望把「
社會主義文化」轉變成爲「富有中國特色的文化。」
然後，我將採用動態方法，集中在不同組別的平民
百姓身上；他們創造自己的新文化。

共黨當局及官方傳媒

中國正每日加緊努力在群眾當中推動「新社會
主義文化」。官方傳媒定期呼籲加強群眾的「愛國
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思想。

江澤民在共產黨十四大五中全會（一九九五年
九月廿五至廿九日）上發言，按建設「精神文明」
（註二）的五年計劃（一九九一至九五年）的綱領
而強烈譴責幹部以至政治局成員，「把自己的頭埋
在經濟改革的沙土中，卻忽略意識型態的工作。」
他提出「以政治爲先」這重點口號。去年冬季，當
局要求農民展開一場政治運動。春末，八十七萬農
村黨書記、幹部及村委領導接受思想和管理的特殊
訓練；五萬個村黨基層組織成爲整頓的對象。在城

市，大眾傳媒在四月及五月不斷闡釋「講政治」這格言，從而開始了一場思想運動。除了傳遞「淨化思想和社會主義文化」的訊息外，運動也指向提高大眾對黨的支持，並號召人民合作，對抗經濟貪污、色情產品的擴散，也抵抗「來自海外的腐敗思想」的影響。當局要求專上學院和出版協會堅持思想工作，好能加緊控制。六月中旬，為準備慶祝黨成立七十五週年，大眾傳媒便開始以強硬的態度，維護黨的馬克思主義基礎。

最近官方積極傳播「社會主義文化」。一九九零年，李瑞環向全國文學及藝術工作論壇發表講話。他說認為特殊的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型態，反映特殊的政治及經濟，而轉過來對社會政治及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經濟是基礎，政治是其濃縮的反映。當人們討論中國文化的問題時，不應忘記基本的馬克思見解。建設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新社會主義文化，應把國家形式與社會主義內容結合。基本上，這文化符合中國的實情，反映我們的社會主義生活，揭

示實際的社會關係的要素，重視歷史發展，並刻劃社會主義時代的精神。這新文化既植根於社會主義政治及經濟，並專為此服務。沒有這新文化，中國將不能完成這歷史性任務，就是建設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註三）

中國當局似乎純粹視「文化」為一種「意識型態」。他們確信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堅定不移的，是十分適應中國的情況（「富有中國特色」），也是唯一適合人民共和國全體人民的方法。因此，當局強調唯一而官方的思想，強調「國家文化」和「國家本體」。這思想能配合群眾的渴望，也能改他們的生活（文化應「促進群眾和社會主義」。這裡所強調的是「化」，即影響和改變他們）。

中國當局在建立「新文化」方面所擔當的基本角色，就是傳播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即社會主義道德、禮貌、無產階級民主、法律觀念、社會秩序、紀律、誠實、科學與技術的先進學習、培養國家統一與團結等。為求達致這些目標，一切方法都可以

用上，甚至是強硬的措施亦然，對抗貪污、罪案、社會邪惡、派別活動與分裂主義時尤是。

中國領導人很早已承認，應發掘各種方法，向群眾傳遞思想和價值觀念；他們相信這些方法對革命目標來說是重要的。為達到這目的，他們已制訂一個大規模和精密的傳播系統。此外，他們已改造傳媒的所有傳統形式，包括藝術和娛樂。他們懷有雄心勃勃的目標：創造一個新文化、社會主義文化以及因而轉變整個中國人民思想和行爲的基本模式。他們所強調的價值觀念有些是植根於傳統的；其餘則是完全新的，但一切都是來自「官方的思想」。

一九八三年，鄧小平訂下組織及思想戰線的緊急任務：

思想戰線上的戰士，都應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在當前這個轉變時期，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他們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責任尤其重大。……作為靈魂工程師，應當高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

的旗幟，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學、演講、表演，教育和引導人民正確對待歷史，認識現實，堅信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鼓舞人民奮發努力，積極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為偉大壯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而英勇奮鬥。（註四）

然而，官方更深入關注並致力幫助人民甚至獲得「客觀事實的正確認識」。

換句話說，客觀事實包含社會概念的成份，而黨的角色就是提供理想的環境，好使事實的思想因素會得到正確的認識。只有這樣，才能在廣大的人民當中培養正確的良知。因此，黨利用大眾傳媒作為一種工具，以協助正確認識的過程，好使中國人會知道當局所渴望他們知道的事物，看到當局所渴望他們看到的事情。在黨領導人的思想裡，正確無誤比自發性更加重要。（註五）

今日，中國當局似乎接納儒家官吏的傳統路線；

在過去皇朝的日子裡，那些儒家官吏極力把儒家思想強行成爲「官方思想」，對抗其他思想潮流。

官方反對「完全西化」，也反對西方的腐敗文化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而滲透中國。當局只懷著批判的態度來作文化交流。按李瑞環的說法，吸收外國文化，並非是爲了取代國家文化，而是使之豐盛和發展。利用外國文化時，必須以中國所面對的實際情況作爲基礎。外國文化工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必須受到查驗，也要符合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計劃的要求和中國文化的發展需要。這些文化工作應按照馬克思理論和方法論來分析、分類和轉變，好使「外國事物符合中國」。（註六）

官方的理論家

在「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官方公式下，作爲黨代表的幹部和知識份子，就只能根據馬克思思想來了解文化。他們的目標就是證明黨的官方政策是合理的，而黨的政策適合轉變中的國情。

目前，黨正集中致力證明政府把中央計劃經濟系統持續轉爲市場經濟的政策是正確的。他們也強調經濟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並推動文化作爲國家穩定、秩序與統一的工具。因此，文化亦已成爲對抗「分裂主義」這戰爭中的武器。最近，中國文化部長劉忠德稱聲，西藏自治區在戰略上是舉足輕重的特殊地方，也處於最前線，抵抗由達賴拉嘛集團發動的分裂活動。中央政府亦將採用方法，促進西藏的文化工作，也加緊西藏與中國其他地方之間的文化連繫。（註七）

民間的動態文化觀

那些無須代表官方立場的知識份子與藝術家，對文化表現出更富創造力的態度和了解。

不論在城市的街道或鄉間，平民百姓都不花時間在任何文化概念上。然而，在鄧小平提出「應容許農村地區和城市的一些人先富有起來」這呼籲後，他們就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裡，一直爭取改善自己的

生活水平，並建立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念、行為模式、傳統和制度、信仰和信念。這一切給他們帶來群體的認同感、安全感和持續感。

根據他們過去不同的歷史，現時不同的事務、職業和生活條件，這些人正創造自己特別的「文化」。鄉下人與城市人的文化不同。農民的文化與漁民或工人的文化也不同。知識份子與學生也創造一些與官僚意向不同的東西。

年輕一代所關注的，遠非那些老革命份子所關注的文化問題。這些「新文化」經常被視為「主導文化」內的「次文化」。但是，尤其當涉及相同語言群體，如廣東話或上海話，或少數民族，或信奉同一宗教的群體，那麼，在意義上說，他們就應被視為不同的「文化」。

新的文化面貌

為表達本文主旨，我現將略述知識份子、城市人、鄉民與年輕人當中主要的新文化展現。

知識份子與藝術家

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下，也在運用自由的限制下，中國的知識份子與藝術家以如此創造的精神滋潤了文化界，而評論家把解放到一九八九年的時期稱為新時代。很多人審慎嘗試成為社會「批判的良心」，暴露官方制度及政策的不良效果、改革步伐的阻滯、過去主要的政治錯誤、一些中國傳統的負面影響，甚至知識份子的傳統角色，即充作「政府的卑賤工具，既不願意亦不能在中國社會裡形成一股獨立的力量。」他們中有些人甚至敢於為新的社會政治訂下具體的解決方法。哲學家、政治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科學家、未來學家、藝術家、人權活躍份子以及異見者一起進行討論和辯論，因而激發「新文化」的昇起。他們所主要關注和涉及的問題，都是環繞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和重新解釋、中國與外國文化之間的關係、現時中國文化及其未來前景的特色。

這些知識份子表現出反傳統的思想，而自從本世紀開始，這思想便橫掃中國。他們抱怨傳統文化導致發展不足、缺乏個人良知、盲目崇拜及服從權威、教條主義以及被動性等。有些人甚至表示懼怕他們偉大文明的骨幹可能崩潰而無法修補；這文明在十九世紀期間萎縮，也在「五四運動」中受到批判。然而，他們並非完全拒絕這文明。他們嘗試重新界定它的意義並使它再次充滿生氣。

雖然某些藝術家追隨傳統的方法，卻也開啓新的途徑，從現實主義（甚至採用「圖片現實主義」的技巧）至印象派，從風俗主義以至把抽象派繪畫與流行藝術結合。

作家明顯地在創造這「新文化」中擔當領袖角色，他們透過經常引起爭議的文學著作、報導、詩詞、戲劇、電影劇本、電視製作、歌劇和歌曲等，來表達這文化。戲劇家和電影導演也透過不同的風格以及深入內容與質素來顯示創造力，他們經常獲得國際的表彰。（註八）

官方對他們在革新和創造力這兩方面的努力感到不快，因而展開各項反對藝術家與知識份子的運動，例如：一九八三至八四年的「反精神污染運動」、一九八六至八七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完全西化運動。

在辯論傳統中國文化的態度和重新詮釋時，近年最重要的插曲，就是中央電視台在一九八八年播映的六集紀錄片——「河殤」，觸發一場有關重新檢討中國文化身份基礎的激烈爭論。紀錄片把黃河象徵中國文化和歷史；黃河雖然給中國帶來了光輝壯麗，但也使她在其淤塞的泥黃水中搖晃地行走。河是專橫的和不可預測的，既賦予生命也毀滅生命。它永恆不改，但變幻無常。對很多中國人來說，紀錄片的訊息是清晰的：只有拒絕過去，建立一個「新文化」（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中國才有希望晉身現代世界。官方當局把這訊息稱為「國家與歷史的虛無主義」。他們禁播紀錄片，認為該片煽動強烈爭論。這爭論一直沒有減弱，直至當局在八九

年天安門「六四事件」後採取強硬措施才被抑制下來。一九九零年八月，統戰部嘗試抗衡「河殤」，播出四集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紀」為主題的電視紀錄片。這節目試圖讚揚官方的四項基本原則以及共產黨四十年來的不斷勝利。

天安門事件使知識份子陷入困境，也使他們新發展的文化處於險境。保守派官僚和官方的理論者很快地採取強硬路線，對抗所有思想自由的人。他們譴責這些知識份子的努力，視之為西方壞影響所帶來「知識污染的過份行為」。著名的知識份子受到清算，而他們中很多人被迫流亡海外，因而迫使這「新文化」也移居外國。所有出版刊物和出版社被帶回這路線上，受命強調「以政治為先」和「思想潔淨」。

自從天安門事件後，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已感到相當失望和失落。官方所主要強調的「新社會主義文化」，幾乎要控制他們的創造精神。

據當代大學生及傳統中國文化工作組進行的一

項調查顯示：「百份之八十七點一的大學生支持發展傳統中國文化。雖然大部份回應者並不贊同盲目服從、大男人主義、墨守成規等傳統觀念，仍有些人依舊相信這些觀念是『切身的』……。」（註九）

至於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之間的關係，上述調查發現，「在那些完成問卷的學生當中，只有百份之十認為傳統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優勝，而只有百份之一表示西方文化優勝。大多數人認為不能作出這樣的比較。因此，大多數大學生被問及文化結構時，便主張中國應持守傳統學習或綜合中國和西方……。」（註十）

以下是一些不容否認的事實，「自一九七八年，中國對外開放後，外國文學和藝術便成爲中國文化生活的一部份——在十年前這是不可思議的。」（註十一）進步帶來了很多技術和科學知識、新的價值觀和事物，也使思想大大開放。沒有人能否認今日中國文化似非而是的特色，例如：與傳統文化之

間的拒絕／認同（恨／愛）關係，個人在其自主與家庭／家族、集體與社會／國家之間的衝突關係（對人權、對社會與國家、對政府方針的新認識．．．），現代與科學方法、昔日的家長式的和被動的傳統之間的矛盾，官方思想方法的約束與學術研究及藝術創作之間的衝突。此外，社會主義的固定界限與文化內容的豐饒（尤其當處理宗教價值觀時所感到的）矛盾。這一切都是不容否認的因素和表達方法，顯示出在創造的過程中存在新的事物。

城市居民

住在市區的人（官方數字為三億人，而人口正每日上升）也參與建立他們自己一套新的文化價值觀。這些人一般都是受過教育和較開放的。他們重視親身經驗，也接觸大眾傳媒、現代潮流和外面的世界。這些經驗提高他們的野心和增加他們的興趣。

持續的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已導致人民更著重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一九九五年一月，《中國廣

播新聞》在一篇官方的報導中指出，城市人的態度轉變得很大：他們更關注經濟效益，承認致富的念頭是積極的，接納合理的競爭和壓力，例如：價格上升、合約勞工等。他們也批判傳統的意念——「官員超越一切」，更加自力更生，不再因所謂「信念危機」而感到迷惘（「信念危機」在七十年代後期出現，當時的經濟改革被視為違背正統馬克思想）。他們更關注科學和技術，視之為賺錢的資源，而且不再害怕改變和危機等。（註十二）

一九九六年初，公開的調查顯示：（註十三）

十六年來的「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經已轉變城市人的興趣和選擇：中產階級冒升，具有潛力在全球經濟中舉足輕重。對這階層的人來說，隨著有更多消費品供他們選擇，使城市人變得老練，並物色更時尚和高科技的產品。據另一項國家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超過百分之八十的中國城市人贊同，對於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市場經濟是重要的，他們指出文化必須配

合經濟發展。從接受訪問的一萬五千人顯示，在過去三年，大多數人都已習慣計劃經濟過渡至市場經濟期間所出現的轉變。新華通訊社引述：「雖然人們仍認為最難容忍的事，就是失業和在工作及日常生活中彼此競爭的壓力，但他們對突然發出的社會轉變，例如工資增長的懸殊、物價高漲、需要作出犧牲等，都比以前堅強。」當問及何者對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時，大部份被訪者提出：健全的司法制度；有教養的公民；平等權利；家庭計劃政策；政治民主；善用時間；增加效益——雖然百份之七十五的被訪者表示，如果他們的權利和利益受到侵犯，便會訴諸法律。新華通訊社引述民意調查說，有些傳統見解仍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要中國人民真正接受一些新思想，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城市正見證著「中產階級」（或「新貴」）的升起，而這階級是經濟改革所迅速創造的。這新「

中產階級」由個別企業家、國營、集體及私營公司經理、專業人士和專家所組成。他們越來越渴望掌握自己的生活，甚至在社會和政治舞台上擔當角色。他們正開始建立一套中產階級價值觀的傳統，是一種「城市文化」，但是，顯然不是沒有任何衝突的。

城市的人口強調知識和科技訓練是賺錢的方法，而且為他們兒女的教育也是必須的。這顯示前與後工業思想和文化之間持續的心理衝突。前工業思想及文化倖存的標記仍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工具、設施、房屋等經常欠缺維修保養等；在掙扎求存中，禮貌看來是不合時宜的了，人們擠上公共汽車、在行人道駕駛摩托車和車輛、響起汽車喇叭、行人險象橫生等。

最近有一種文化現象，在大城市中到處可見，也迅速散佈在鄉鎮和農村裡，這就是「大眾文化」的升起。這現象由「大眾文學」形成，即由小報、小雜誌、單張、動畫所組成的大眾文學，以吵鬧的傳奇故事、武俠傳奇小說、間諜故事、科學小說、

電影明星或其他名人的感性自傳、有關皇帝和妃嬪的誘人故事、遊戲手冊、武術、體操、舞蹈及健康守則等，來逗弄讀者。最近，市場上亦加添了錄音帶和鐳射唱片，吸引年輕的一代。

這「城市文化」已在社會行爲模式和習慣中體現出來，例如：穿著奇裝異服，新潮的髮型，擁有的名牌貨品，在昂貴的食肆進餐，成群結隊地走進的士高、卡拉ok和酒吧，炫耀最先進的影音器材，參加公開舞蹈班等。當局意圖保存某程度的倫理標準，嘗試取締這一切「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事物，縱使有時成功，有時失敗。他們認為「高級文化」的衰落，顯示「精神建設正落後於物質建設」。他們的努力之所受挫，原因之一是多低層幹部和領袖並不認為這大眾或通俗文化惹人憂慮，而且不一定是低級的。（註十四）

鄉間居民

在中國，鄉民與城市人的文化系統一向是不同

的。隨著當局在八十年代推行農村自由化政策，這懸殊變得越來越明顯了。鄉民（官方數字是八億人）正享受和利用更多自由、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增強他們的購買力、爲自己興建新房屋、購買「四大項目」——單車、縫衣車、收音機和腕錶——以及一些較昂貴的衣服和物品。

由於這些經已改善的條件促使他們不但要恢復古老的習俗，也要採納由別處最近的改變、或由大眾傳媒所帶來新的和現代的方法，因而創造自己一套新穎而可接納的文化。他們並不思索文化本身，卻對過去和新的事物懷著開放態度，他們在面對文化時，視之爲充滿動力的事物，需要協商、處理、達致和由自己創造的事物。在鄉間，人們一般傾向保守主義，但只要涉及經濟，他們便明顯地向改變開放。他們的興趣和態度一般都是實際的，並尊敬傳統習俗。這一切主要關乎鄉村節日和慶祝、家族與家庭禮節（婚禮、葬禮、掃墓、修建寺廟、參拜寺廟等）。（註十五）

隨著入息增加，他們也接納現代衣著；他們想擁有自己的電視機、冰箱、電話，甚至汽車或其他運輸工具。一些較不正直的人，很快便學會「交易的把戲」。他們不惜使用非法途徑來賺錢，爲了賺錢而欺騙別人。但是，在農村地區裡，「詐騙案」的數字並不高。對大多數人來說，除了有時揮霍少許金錢外，他們都按照一般中國平民百姓的傳統智慧，致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建立一套新的價值觀念及行爲系統，而一般平民百姓都以實際和全面的態度處世行事。因此，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野心，大致上都是局制於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跟每個接觸的人以及大自然和靈界都能和諧共處（好的連繫）。他們也表現出關注團體的福利，致力改善公共服務。他們對於下一代寄以厚望，儘量供給子女比自己更好的教育。因此，年輕的鄉民比自己的父母更表達出對文化的要求。他們在空閒時間閱讀小說和雜誌、唱流行歌曲、上體育館和舞廳等。他們在尋找新的和更好的生活，他們更經常往城市觀

光並參與城市活動，因而有助縮減城市與農村思想之間的分歧。

年輕的一代

在中國全境，尤其在年輕人當中出現了一種「普及的或共通的文化」。這現象從未在世界的歷史中發生過。這特別的「文化汲取世界各地的價值觀和表達方式」。（註十六）這種文化包括搖滾樂、通俗藝術、科技知識與電腦行語、卡拉ok、電視的宣傳口號，他們也熟悉大多數世界著名影星、歌星、運動員、藝術家和公衆人物，喜歡穿運動衫及其他名牌衣服，唱流行歌曲，玩撲克，收看同一電視片集（如：星空奇遇），採用同一的問候語（嗨、Gimme five, 甚至God Bless）等。

這文化建基於同樣的興趣、品味和表達自己的方法，促進全球年輕人彼此的溝通，並建立一套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念。

這些外在的文化展示雖然是普遍的，但亦與他

們所生活的環境緊密連繫。在較深入的程度，他們反映不安全、煩惱和失望等共同感受。這些感受轉過來展示在尖刻、對人的存在抱持著宿命的態度、某程度的違法行爲、反叛和身處邊緣等情況中。專家稱這狀況爲「灰色文化」。

結論

中國政府當然直接捲入形成新文化這富創造力的過程。他們深深感到有責任傳播自己認爲唯一適合中國的思想，這是指新社會主義文化。然而，就「文化」本身而言，始終最要緊的，還是平民百姓對文化形式的接納和同化。在中國，有不同的群體，爲了表達自己在社會上的立場和利益，正創造自己的「文化」。沒有任何龐大的社會能只擁有單一的文化或思想，甚至列寧自己也承認這一點。龐大的社會應接納多元化，而任何指向一律性和唯一主義的努力，都是注定失敗的。對於一個好像中國這麼廣大和多元化的國家，這尤其是真的。

雖然一個國家能植根於一個「主導文化」，但經常同時出現一些「次文化」以及「大眾或通俗文化」。歷史和經驗很快指出，在人民身上強加一種文化或思想，往往導致「抗衡文化」的出現。此外，今天，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擴散的「普及文化」也看來是無可避免的。「只從西方進口先進管理技術、科學和技術，而阻止價值系統、思想模式和競爭感，這是不可能的。」（註十七）

最後，我們必須謹慎考慮，那真正影響著群眾的生活和行爲的，並非政府的指示、當局下令的文化措施、甚或知識份子的文學著作，而是通俗文化、群體文化和「另類文化」。

（註釋見本刊第九十四期英文版頁2021。）